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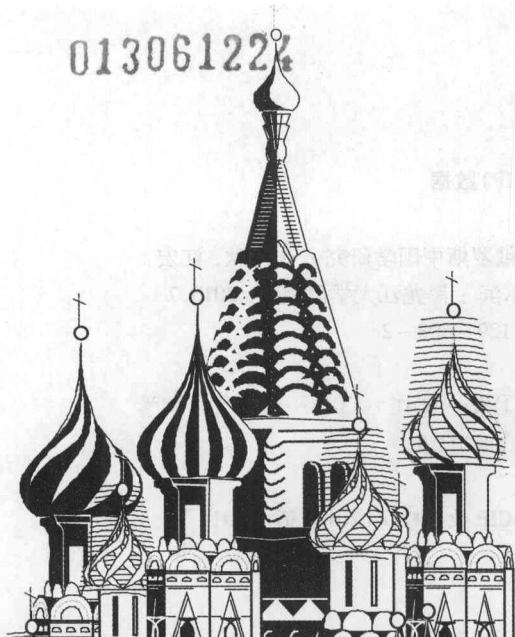
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

中国学研究

朱达秋 江宏伟 华莉 著

013061222

K207.8
25



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 中国学研究

朱达秋 江宏伟 华莉 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666948

K207.8
25

4551008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中国学研究 / 朱达秋, 江宏伟, 华莉著. --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81129-608-2

I. ①苏… II. ①朱… ②江… ③华… III. ①中国学-研究-俄罗斯 IV. ①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4914 号

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中国学研究
SULIAN JIETI ZHIHOU DE ELUOSI ZHONGGUOXUE YANJIU

朱达秋 [江宏伟] 华莉 著

责任编辑 安宏涛 张微微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67 千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9-608-2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俄罗斯的中国学(代前言)

新俄罗斯的中国学指的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学者,特别是俄罗斯的中国学学者对中国的研究。

俄罗斯的中国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其学术传承源远流长。

俄罗斯中国学滥觞于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正是从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中走出了以伊拉里昂·卡利诺维奇·罗索欣(Илларион Калинович Разсохин 或 Россохин, Рассохин)、阿列克谢·列昂季耶维奇·列昂季耶夫(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ьевич Леонтьев)为代表的第一批俄罗斯中国学学者。

俄罗斯中国学崛起于19世纪上半叶,标志是被誉为“俄国汉学奠基人”的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法号雅金夫,也译:亚金甫)[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 (Иакинф)]的学术活动,比丘林成为俄罗斯中国学发展的时代象征。正是从比丘林开始,中国学著作在俄罗斯被学术界、文化界广泛认可,俄罗斯的中国学赶上西方国家的发展步伐,俄罗斯一跃成为仅次于法国的欧洲第二个中国学大国。

俄罗斯中国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19世纪下半叶,标志是大汉学家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中国名:王西里,也译:魏西里夫)的学术活动。瓦西里耶夫创立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学派——圣彼得堡学派,他以杰出的学术成就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当选俄罗斯皇家科学院院士的中国学学者。正是在瓦西里耶夫和彼得·伊万诺维奇·卡法罗夫(法号巴拉第,也译:鲍乃迪)[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Кафаров (Палладий)]等汉学家的努力下,俄罗斯中国学保持了世界先进水平。

俄罗斯中国学在十月革命后进入新时代。苏联时期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划时代人物是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中国名:阿理克)(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 院士。阿列克谢耶夫对苏联中国学进行了全面开拓,以杰出的学术成果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领军形成了苏联中国学阿列克谢耶夫学派。在以阿列克谢耶夫为领军者和代表的苏联学者的努力下,苏联的中国学发展尽管受到中苏两国关系发展跌宕起伏的严重影响而曲曲折折,但繁荣时期的辉煌仍让人惊叹不已。“出版的中国学的著作的数量就是明证:从 1917—1949 年总共只出版了大约 100 本图书,而从 1950—1957 年仅仅 8 年就出版了 147 本图书,印数在 2300 万本,又过了两年,其数量增加到 668 本。许多中国文学著作被翻译成俄语,然后还用苏联各族人民的 28 种语言出版了 2000 万册以上的图书。在 1958 年开始出版专业性杂志《苏联中国学》。”^①

俄罗斯中国学几百年的发展传承为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中国学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财富。

财富之一是形成了中国学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或中心。从 1818 年建成俄罗斯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第一个东方学文物收藏和研究的机构开始,19 世纪 20 年代,又开设了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后来在苏联时期,改名为莫斯科东方学院)。这所高校成为优秀人才的孵化器,培养了最优秀的中国学学家。正是在这里,集中了最为重要的中国学图书(现在的科学院中国学图书馆)。^②后来又陆续形成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等中国学人才培养和研究中心。到苏联时期,随着中国学的发展,更是形成了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莫斯科大学东方语学院(后来更名为亚非学院)、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等中国学的研究基地。这些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为俄罗斯中国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财富之二是形成了中国学人才源源不断的人才队伍。从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罗索欣、列昂季耶夫,比丘林,瓦西里耶夫、阿列克谢耶夫等三个划时代的领军人物开始到 20 世纪 70—80 年代,俄苏中国学研究队伍形成了俄苏中国学的圣彼得堡学派、阿列克谢耶夫学派,更是成为拥有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中国名:齐赫文)(Сергей Леонидович Тихвинский)、米哈伊

^①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 Россий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Крат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М.: ИДВ РАН, 1994, №11, с. 7.

^②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 Россий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Крат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М.: ИДВ РАН, 1994, №11, с. 5.

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Михаил Леонтьевич Титаренко)、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米亚斯尼科夫(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Мясников)、尼古拉·特拉菲莫维奇·费德林(Никола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Федоренко)、李福清(原名:鲍里斯·利沃维奇·里弗京,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等众多苏联科学院院士或通讯院士的人才大军。他们在苏联时期享有盛誉。苏联解体之后,仍然活跃在学术领域,成为新时代的学术领军人物,为新俄罗斯中国学研究提供人才保障。

财富之三是学术传统和学术地位。俄罗斯中国学从比丘林时代起就已达到西方中国学的发展水平,俄罗斯成为欧洲第二的中国学大国。到瓦西里耶夫时代,俄罗斯中国学则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中国学独树一帜的组成部分。这种学术地位为新俄罗斯中国学的发展提供了较高的起点。

俄罗斯中国学自喀山大学设立蒙古语教研室和汉语教研室开始,就从传教士时代向大学时代过渡,创建了独具特色的俄罗斯大学中国学教育研究体系。从瓦西里耶夫时代俄罗斯中国学形成圣彼得堡学派起,到苏联时期经过阿列克谢耶夫全面开拓,形成苏联中国学的阿列克谢耶夫学派,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发展,俄罗斯中国学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传统。

首先,研究的专业化、职业化。从瓦西里耶夫时代开始,俄罗斯中国学学科分化日益明显,研究领域逐渐走向专业化,经济、历史、哲学、文学、艺术、语言、宗教等逐渐从笼统的中国学研究中独立出来,获得分类的专业研究的特征,并由经过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考古学、法学、社会学等专业训练的学者进行职业化研究。

其次,中国学发展紧随现实的需要,特别是中俄关系发展的需要,其积极作用在于为中国学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直接动力,中国学发展的成果直接促进中俄两国组织文化、科技教育的交往和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比如,“俄罗斯历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的著作研究中国的发展、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斗争,成为苏联制定积极支持中国抗日政策的最重要的道义和政治因素”^①。又如,由于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俄罗斯社会得以了解中国的京剧、国画,以及中国对美的概念,才有了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

^①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 О рол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в развитии диалог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 кита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 Образ Кита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Рус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 2007, с. 8.

行,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才有了徐悲鸿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行,俄罗斯社会才了解了之后中国的全民抗战。^①

研究紧随现实需要的消极影响在于研究的独立性和科学性受到官方立场和政策的严重制约。比如,苏联时期,很多中国学研究就带有浓厚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成为苏联官方立场观点的宣传和阐释。甚至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和敌对,成为攻击和诋毁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窗口和阵地。

再次,研究方法紧随时代潮流。圣彼得堡学派紧随科研方法的时代化,在俄罗斯中国学著作中打下了显著的烙印。俄罗斯到阿列克谢耶夫学派时“在研究方法上有效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沙畹等法国汉学家开创的微观研究方法,强调汉语修养,重视文本翻译和研究,资料丰富、考据精细、注释详尽”^②,研究方法紧随时代潮流成为俄苏中国学的传统之一。

最后,执着的探索精神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执着的探索精神和强烈的批判精神自从中国学第二个划时代人物瓦西里耶夫及圣彼得堡学派身上显著表现出来之后,就成为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中国学学者不断传承的学术传统。这种学术传统尽管在苏联时期官方意识形态和方针政策的高压下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冲击而大打折扣,但并没有动摇其主流地位。

总之,研究的专业化、职业化,紧随现实需要,重视研究方法的时代化,执着的探索精神和强烈的批判精神等学术传统的产生和发扬光大,成为新俄罗斯中国学发展取之不尽的精神和方法资源。

随着苏联的解体,红色帝国废墟上崛起的新俄罗斯在重振大国雄风的进程中,掀起了新一轮研究中国学的热潮,取得显著成就,其原因在于:

1. 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的推动激发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辉煌,令世人瞩目。中国改革发展的独特道路及经验对于苏联解体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精神取向的急剧转型、新俄罗斯寻求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有着极强的借鉴作用。出于重振大国雄风的现实需要,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进行深入和全面的了解,以吸取有利于俄罗斯发展的有益经验,俄罗斯中国

^①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 О рол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в развитии диалог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 кита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 Образ Кита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Рус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 2007, с. 8.

^② 阎国栋:《俄罗斯汉学三百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

学发展迎来新一轮热潮自在情理之中。

2. 中俄关系全面发展的推动

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和发展,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军事交往日益密切,无论是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政策咨询,还是为扩展中俄日益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往准备社会舆论和民主基础,都需要人们深入全面地研究中国、了解中国,中国学一波又一波的热潮也就应运而生。

3.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文学、文化全面拨乱反正的积极影响

随着苏联的解体,唯我独尊、反对离经叛道的官方意识形态迅速土崩瓦解。在社会思想和社会价值多元化背景下,俄罗斯社会全面对苏联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文化及学术研究的立场观点进行反思,拨乱反正。这种全面的拨乱反正也促使俄罗斯中国学学者全面清理苏联时期官方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对中国学发展的消极影响。这有力地刺激了中国学研究成果的繁荣。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大量苏联时期秘密档案的解密开放,大量当事人的回忆录的出版,为中国学,特别是为中国历史和中俄关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这激发了俄罗斯中国学学者的研究热情,也引导他们确立新的研究课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运用新材料确立新观点。这一切成为俄罗斯中国学新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4. 中国文化特殊的精神魅力的吸引

在俄罗斯,中国精神文明被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社会精英看作是中国取得现代化成就的根源。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社会的急剧转型,旧有的社会价值标准被冲得七零八落,振兴俄罗斯的现实需要迫使俄罗斯思想文化精英整合国际国内、东方西方的思想文化资源,以确立团结民主的新的社会精神。然而后现代中精神危机重重的西方精神文化与俄罗斯文化渊源极深,难以充当俄罗斯民族复兴的思想旗帜,人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强调注重天人合一的伦理道德,具有特殊精神魅力的中国文化自然受到追捧,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精神文明的日益青睐成为俄罗斯中国学学者研究中国,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动力。

5. 俄罗斯民众日益增长的了解中国的兴趣的促进

随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和进步,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日益广泛,对俄罗斯普通民众的吸引力也日益增强。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交往不断扩大,也激发了普通民众了解中国的热情,俄罗斯社会

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汉语热。“如果说以前主要是集中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一些研究中心(莫斯科、圣彼得堡)的话,那么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许多城市的许多外语学院、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都设有中文系部,在莫斯科教授汉语的学校也日益增多。莫斯科地区以前的汉语教研室或汉语部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大学的亚非学院、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外贸学院等专业高校,而现在在莫斯科语言大学、人文大学等其他文科院校都设有汉语教研室或汉语部。同时,各种汉语学习班水平也很不错。有的中学也开始教授汉语。这一切都引起了汉语教科书、汉语教学参考书等的出版热。”^①可以说,俄罗斯民众日益增长的了解中国的兴趣,直接促进了中国学走向高潮。

俄罗斯中国学的发展硕果累累,积聚了俄罗斯中国学学者的心血,积淀了他们继承传统又发展传统的底蕴,也体现了俄罗斯中国学学者介绍和研究中国的鲜明特色。

第一,注重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科学性。

注重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科学性是俄罗斯中国学发展的优良传统之一。苏联时期的中国学受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和限制,有着较为严重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常常成为政治宣传的附庸,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科学性大打折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中国学学术界与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大张旗鼓地向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宣战,经过全面的拨乱反正,进一步确立了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科学性原则。按照俄罗斯著名中国学学者季塔连科的说法就是:“在评价事实与现象中要坚持体现原则性和客观性,独立性与没有偏见——这是健康发展俄罗斯中国学的最重要的前提。”^②

第二,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学术队伍。

通观俄罗斯中国学的发展,在俄罗斯社会活跃着一支介绍和研究中国的学术大军。他们中既有在苏联时期就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资深专家,如齐赫文斯基、季塔连科、费德林、米亚斯尼科夫、李福清、波尔加科夫(В. Я. Портяков)、

^① Гудошников Л. М., Степанова Г. А. Российские центры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конце 1990-х гг. // Образ Кита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Рус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 2007, с. 64.

^②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 О рол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в развитии диалог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 кита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 Образ Кита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Рус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 2007, с. 9.

佩列洛莫夫(Л. С. Переломов)、加列诺维奇(Ю. М. Галенович)等,又有苏联时期崭露头角的新生代领军人物,如卢基扬诺夫(А. Е. Лукьянов)、科布泽夫(А. И. Кобзев)、卢贾宁(С. Г. Лузянин)、乌索夫(В. Н. Усов)、克拉芙佐娃(М. Е. Кравцова)等人,更有苏联解体之后异军突起的后起之秀、学术新锐,如华克胜(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波波娃(И. Ф. Попова)、洛曼诺夫(А. В. Ломанов)等人。

老一辈学者以齐赫文斯基等人为代表,他们在苏联时期功成名就,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或通讯院士,在苏联解体后仍宝刀不老,笔耕不辍,奋战在学术第一线,尽显老辈学者的风范。俄罗斯中国学中生代学者在苏联时期开始登上学术舞台,崭露头角。苏联解体后,他们传承传统,坚守阵地,强势崛起,成为俄罗斯中国学新生代的领军人物。新时代新生代学者的学术生涯开始于苏联解体前后,受过相应的专业训练,眼界开阔,锐意进取,思想活跃,成为俄罗斯中国学的学术新锐。

值得指出的是,俄罗斯中国学老中青三代学者选择中国学作为职业生涯,不计荣辱得失,甚至面对困境,却始终奋战在俄罗斯中国学学术领域。尽管有人是出于家学渊源或与中国结下特殊关系的学术情缘,但大多数人选择介绍和研究中国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是出于兴趣,甚至是出于对中国、中国文化由衷甚至是痴狂的热爱。这种学术情怀往往使得他们能够不计荣辱得失,甚至面对困境,安于清贫,坚守阵地,始终耕耘在俄罗斯中国学学术领域。

第三,热点紧随俄罗斯社会需要,冷热不均。

紧随社会需要,特别是中俄关系发展需要是俄罗斯中国学的传统之一。新俄罗斯的中国学学者继承传统,从课题的选择到成果的应用都紧紧围绕俄罗斯社会需要,特别是中俄关系发展的需要。因而,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中俄日益增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紧密相关的领域,与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哲学、中国语言、中俄关系史等相关的学术领域成为俄罗斯中国学经久不息的研究热点。而社会需求不多的中国文学等领域却只能对苏联时期的辉煌望洋兴叹,空留唏嘘,成为学术选题社会功利性的牺牲品。

第四,研究方法和观点多元化趋势明显。

执着的探索精神和强烈的评判精神,研究方法紧随时代潮流,是俄罗斯中国学发展的优良传统之一,这一优良传统在新俄罗斯经过学术界的全面拨乱反正后,冲破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束缚而得到发扬光大。在中国学的各个领

域,各种观点、不同的研究方法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激烈竞争,令人目不暇接。这不仅促进俄罗斯中国学的繁荣,更激励俄罗斯中国学产生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成为俄罗斯中国学发展的一道风景线。当然,也出现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作品。

第五,国际学术联系日益广泛,扩展了研究视野。

随着俄罗斯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俄罗斯中国学突破自我局限,越来越具有国际视野,也不断加强国际学术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俄罗斯中国学学者不仅保持与中国学者的联系,还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特别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同行保持密切的联系和交往,联系和交往的主要形式之一是连续不断地举办中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举办的两年一届的“中国,中华文明与世界:历史、当代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从1989年开始到2011年已经连续举办19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中国社会与国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联解体后仍然几乎每年都举办,到2011年已经举办了41届。圣彼得堡大学从2004年起每两年举办一届“远东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至2010年已经连续成功举办4届。这些与中国学有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每次都有来自中国、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等国的学者参加并有论文在会上交流,会后都出版论文集。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学学者欧洲联合会第14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有400多名学者,来自55个国家。”^①

除了举办有关中国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之外,俄罗斯中国学学者还走出国门,参加他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科研机构与同行进行合作研究,讲学,访学,并且通过人员、成果、信息和资料的交流,使学术视野不断得到扩展。

最后应强调的是,俄罗斯中国学之所以得到不断发展,取得出色的学术成就,是因为其具有坚实的学术平台。

1.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前身是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成立于1966年。

^①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 О рол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в развитии диалог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 кита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 Образ Кита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Рус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 2007, с. 12.

现在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中国学研究中心,是俄罗斯研究现当代中国的领头羊(季塔连科语),现任研究所所长是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院士,名誉所长是齐赫文斯基院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下设8个研究中心,其中东亚经济一体化中心、俄中关系研究与预测中心、俄罗斯与亚太地区合作研究与预测中心、中国当代历史与政治中心、东亚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主要以中国为研究对象。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在国际国内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表现之一是:集结了俄罗斯中国学的主要研究力量。这支队伍由齐赫文斯基院士和季塔连科院士两大俄罗斯中国学泰山北斗式的权威领军,拥有佩列洛莫夫、索罗金(В. Ф. Сорокин)、卢基扬诺夫、加列诺维奇、乌索夫、卢贾宁等众多著名中国学学者。

表现之二是:推出了一批傲视世界中国学学界的学术成果。如199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百科全书》(这是首次用欧洲国家语言出版的中国哲学辞典)、2006—2010年出版的六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①大量收集了以前未公开的秘密档案资料的五卷本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20—1937)》,还有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在现代化与改革道路上奋进的中国(1949—1999)》、《中国、文明和改革》等等。

表现之三是:出版发行俄英双语的《远东问题》(«Проблем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杂志。这是俄罗斯唯一以中国学为重点的定期刊物,也是国际学术界了解俄罗斯中国学学者研究方向和重点以及学术成果的主要窗口。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是世界著名的中国学国际交流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中国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它定期举办的“中国,中华文明与世界:历史、当代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每两年一届,至今已经举办19届)享誉世界。它还常常邀请世界同行开展学术交流,每年都有他国的同行来研究所访学和研究。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是俄罗斯颇负盛名的中国学人才培养基地,拥有

^① 该套大典原计划出版五卷,所以在封面上均注明为五卷本,但最后增加了一卷《艺术卷》。[Том 6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Искусство. // Редакторы тома,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А. И. Кобзев, С. А. Торопцев]

硕士、副博士、博士学位授予权。

2.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是俄罗斯中国学的重要中心之一。1930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成立后,建立中国研究部。部主任由俄罗斯中国学的奠基人、划时代人物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担任。1951年,东方学研究所迁往莫斯科。

东方学研究所的中国研究部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由3个研究室组成:古代历史与中世纪历史室、近代史与现代史室、意识形态与文化室。中国研究部现任主任是著名中国学学者科布泽夫。另外东方学研究所下设的东方民族文献部、比较文化学部、亚非民族语言部也有不少中国学学者,他们主要研究汉语和中国文学。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著名的学者杰柳欣(Л. П. Делюсин)、博克夏宁(А. А. Бокщанин)、科布泽夫、霍赫洛夫(А. Н. Хохлов)、戈雷金娜(Ки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Гольгина)、谢罗娃(С. А. Серова)在中国历史、哲学、戏剧学等俄罗斯中国学领域颇具影响。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在学术界拥有较高的学术地位,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和研究,俄中关系,俄罗斯中国学史等学术领域独树一帜,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如维亚特金(Р. В. Вяткин, А. Р. Вяткин)父子翻译了司马迁的《史记》,这是世界上关于《史记》的第一个西方语言的全译本。科布泽夫参与主编了《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全部六卷的工作。中国研究部每年举办一届“中国社会与国家”国际学术研讨会(至2011年已经举办了41届),每次研讨会后都出版论文集。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主编的《东方》(«Восток»)、《今日亚非》(«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等杂志,也是俄罗斯中国学学者的学术平台,是国际国内学术界了解俄罗斯中国学的发展动态和成果的重要窗口之一。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也是俄罗斯颇负盛名的中国学人才培养基地,拥有硕士、副博士、博士学位授予权。

3.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①

① 又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也是俄罗斯中国学的重要研究基地之一,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在 2007 年更名而来,其再前身是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是 1956 年在东方学研究所留在列宁格勒的手稿部基础上成立的。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下设 5 个分部:近东和中东分部、远东分部、古代东方分部、手写文献部、中亚和南亚部。此外,还设有图书馆。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在中国学领域极具特色——利用收藏极为丰富的中国学文献获得独领风骚的成果,特别是其敦煌学在世界敦煌学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学术地位,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代表性成果有 17 卷本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1992—2001,由该所与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献》(由中俄学者合作整理出版)。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也培养中国学研究人才,拥有硕士、副博士、博士学位授予权,还出版有自己的定期刊物《东方文字文物(古代文献)》[«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 (ППВ)»]、《东方民族的文字文物和文化史问题》[«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и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ППиПИКНВ)»]等。

4.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н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при МГУ им.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а)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是由莫斯科东方学院更名而来,它的再前身是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远东历史教研室和汉语教研室则分别是在 1944 年和 1949 年建立。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汉语和中国学人才培养中心,培养了米亚斯尼科夫、博克夏宁、杰柳欣、佩列洛莫夫(嵇辽拉)、宋采夫(В. М. Солнцев)、马利亚温(В. В. Малявин)、鲁缅采夫(鲁勉斋)(М. К. Румянцев)等著名汉学家,也培养学士、硕士、副博士、博士。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更是俄罗斯中国学重要的研究基地,特别是在汉语、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和中国历史等中国学领域,人才济济,成果卓著。研究汉语和西夏语的有索夫罗诺夫(苏敏)(М. В. Софронов),译介和翻译中国文学的有著名的中国学专家沃斯克列夫斯基(华克生)(Д. Н.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有马利亚温、梅利克谢托夫(А. В. Меликсетов)、瓦西里耶夫(К.

В. Васильев)、拉宾娜(З. Г. Лапина)等,研究中国民族学的有克留科夫(刘克甫)(М. В. Крюков)。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还出版有《莫斯科大学学报》第13序列《东方学》(«Вестник МГУ», Серия № 13.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其中有不少是研究中国学的学术论文。

5.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Восточный факульте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具有辉煌的历史。它正式成立于1855年,俄罗斯中国学发展史上两位划时代的人物——大学者瓦西里耶夫和阿列克谢耶夫都在此工作一生,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俄罗斯中国学发展史上声名显赫的圣彼得堡学派和阿列克谢耶夫学派。然而,十月革命后,圣彼得堡大学(后改名为列宁格勒大学,现为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几经改造和沉沦,1944年才得以重建。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是俄罗斯汉语和中国学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历史上培养出了齐赫文斯基、波波娃、托尔钦诺夫(陶奇夫)(Е. А. Торчинов)、索夫罗诺夫(苏敏)、克拉芙佐娃等著名中国学学家。现拥有学士、硕士、副博士、博士学位授予权,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一起代表着俄罗斯汉语教育的最高水平。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也是俄罗斯中国学最重要的研究基地之一,以著名的汉学家谢列布里亚科夫领军的中国学研究队伍颇有建树,成果令人瞩目。其中,谢列布里亚科夫的杜甫、陆游和宋代笔记研究,斯莫林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司格林的汉语音韵和民间文学研究,庞英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萨莫伊洛夫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罗季奥诺夫(罗流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等,更是取得骄人的成就。

值得指出的是同属圣彼得堡大学但属于哲学系的著名汉学家克拉芙佐娃和索洛宁(К. Ю. Солонин),前者以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成为俄罗斯中国学研究的新生代领军人物,后者以佛教和西夏学研究令人瞩目。

另外,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克服重重困难,自2004年起重启中断多年的每两年举办一届的“远东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并扩展为与中国友好学校合作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至2010年该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举办了4届,每届都有一个中国文学的主题,每次研讨会后都出版论文集,大大扩展了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在国际国内的学术影响,提高了学术地位。

此外,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还出版两种综合性刊物《东方学》(«Востоковед-

дение»)和《亚非国家历史编纂学与史料学》(«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и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е истории стран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目 录

第一章 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中国哲学研究	1
一、俄罗斯研究中国哲学的历史沿革	1
二、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掀起研究中国哲学热潮的原因	3
三、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掀起研究中国哲学热潮的主要表现	5
四、俄罗斯的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	23
第二章 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中国政治研究	30
一、中国政治研究的历史概述	30
二、近 20 年中国政治研究状况	40
三、中国政治研究的主要机构及研究者	66
第三章 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中国经济研究	68
一、中国经济研究的历史概述	68
二、近 20 年中国经济研究的主要成果	84
三、中国经济研究的主要机构及研究者	114
第四章 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中国历史研究	117
一、中国历史研究的状况综述	117
二、近 20 年俄罗斯中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	128
三、近 20 年俄罗斯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突出成果	151
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中国学历史研究的特点	156
第五章 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	159
一、俄罗斯译介和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的状况综述	159
二、近 20 年俄罗斯译介和研究中国文学的领军人物	172